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对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反思

彭立峰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观性;“无我之境”;主观性;“有我之境”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8)01-0047-03

“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分“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1]。纵观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方法论之演化,似大体可以概括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争议之进程。本文反思西方史学方法论的这两种不同境界,以期为我国史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无我之境”

“无我之境”可以说是19世纪执西方史学牛耳的客观主义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客观主义史学将“客观中立”奉为史学研究的信条,要求史学家应保持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无论是取舍史料还是理解史料,都要做到不偏不倚,以如实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例如德国学者兰克认为史学著作必须“如实直书”。而学者伯里也提出:“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2],仿佛菲士泰尔·德·库朗热所说:“不是我在讲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2]¹²。可见,客观主义史学正是试图通过排除主观因素的“无我之境”式方法论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

客观主义史学深受近代经典科学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决定论思想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单值确定性,其发展具有完全必然性,科学因之具有完全可预测性。因此,如果存在一种智能物,能感知世界上所有粒子的初始状态,则可完全计算出过去、未来的各个状态,这就是著名的拉普拉斯妖。客观主义史学基于历史与自然同质的信念,接受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普遍化的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提

出了著名的亨普尔覆盖律^[3],并试图以自然科学为范式来重构史学的科学性。

客观主义史学认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这些已经发生的、动态的人的自身活动与人类活动的过去,具有暂时性、隐蔽性和不可逆性等特征,使得史学家不能跟历史客体建立起直接的对象关系,但是历史学家借助客观的史料这一媒介也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这是因为史料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记录,虽然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人的主观意志、要求和愿望,但总会有不依赖史料创造者的客观内容,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反映着历史客体。历史学家只要秉着客观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就能重现历史的真相。英国学者阿克顿乐观地认为:“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2]¹³。

显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史学家须持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由于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科学不能超出事实的领域,把史学看作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体系,旨在把握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历史的客观性基于客观外在的事实,因此,所谓的客观态度意味着史学家只能以不同方式客观地认识事实,而不能掺杂自身的主观意识。科学的方法就是不含价值判断的实证方法。价值中立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必然要求。难怪美国学者德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客观历史的概念等同于‘不受价值影响’的历史”^[4]¹⁹。因此,客观主义史学家极力强调“中立”、“公允”,例如英国学者托尼认为史学家必须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压抑自己

的想象和偏好,努力聆听自己内在理性的声音。其实质是旨在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仿佛“让研究者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将头脑洗净,把脑中的镜子擦亮,把镜子对准探索的目标”^[5],通过此种“无我之境”来客观地再现历史的真相。

二、“有我之境”

客观主义史学“无我之境”的方法论自20世纪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乃至颠覆性的质疑和批判。主观主义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排除主观因素的“无我之境”纯属空中楼阁,并使“有我之境”方法论成为主流。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史学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部分史学家认为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本体,但历史本身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不具有客观性。例如德国学者狄尔泰(W. Dilthey)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在于:历史是人的精神生命,史学是对精神生命的研究,只能是内在的体验,整个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精神史^[6]。而英国学者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7]。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 Croce)则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精神之外不存在外在之物,精神不是外在的,而是人的内在之物。历史是精神的产物,二者是统一的^[8]^[34]。而德国学者李凯尔德(H. Richet)虽然承认历史本体的客观性,但是客观的历史本体就像“自在之物”,对于史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那些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历史叙述的对象。因此,理论的即普遍的价值联系无法排除,也不应排除^[9]。所以“历史永远应该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8]^[34]。

史学研究媒介——史料具有主观性。史料本身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并非历史本身,故“无我之境”只是臆想。美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10]。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Lucien Febvre)认为:“这里有原始的素材吗?没有,只有历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历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和令人振奋的劳动,发现和制造素材”^[11]。克罗齐则认为:“所谓历史文献,不论是书写的、刻凿的、绘画的、录在唱片上的,或者以骨骼和自然界的化石形式出现的,只要不引起和确认我心中的记忆和心灵经验,它们就不是和不可能作为见证,就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它们只不过是——一堆颜料、废纸、石头、金属”^[8]^[34]。

史学家研究具有主观性,在史学研究中主观性

不可能被排除干净。波兰学者沙夫认为:“如果认识的客观性意味着排除人格的一切个人特征,如果无倾向性是指避免作出判断,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价值体系,如果判断的普遍适用性在于消除一切个人和集体的差异,那么这样的客观性纯属虚构,除非把人看作是一种超人的存在”^[12]。贝克尔则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排除个人的权衡”;“无论怎样净化了仍然是人,是一个……具有兴趣、嗜好和教养的生物,任何自制都不会使安德鲁·D·怀特变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或者使他们成为中性的镜子”^[4]^[33-44]。而在美国学者凯尔纳等人眼里,即使是史学话语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13]。

史学检验标准具有主观性。基于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批判者们认为史学中不存在客观、唯一的检验标准,标准取决于主观或先验之物。英国学者波普尔认为历史是需要史学家去猜测的,史学研究只是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不可能真正如实地表现过去的历史,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解释。^[14]后现代主义学派则认为:史学研究对历史的解释之所以站得住脚,不是依据于相应的历史史料,而是通过与“其他解释的对照”^[15]。而德国学者文德尔班则将先验的“普遍价值”作为标准^[16]。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和布莱德雷均认为史学标准“来自经验”。

综上所述,批判者们认为史学研究实乃处处“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1]^[34]。“无我之境”的方法论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三、反 思

19世纪“无我之境”方法论使西方史学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将一系列实证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果。“从1814年到1914年这以往的一百年中,人们进行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大量研究,研究伸展到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研究是细致的、带批判性的、详尽的(甚至使人筋疲力尽)。我们的图书馆塞满了大量的这样积累起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17]。但由于它建立在“机械世界观”基础之上,受自然科学思想支配,仅关注世界本身,僵硬地理解客观性,将价值与客观性对立起来,拒绝承认价值在科学认识中存在的合法性,并要求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从历史研究中排除出去,从而不仅在一般意义上缩小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在特殊的意义上否定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而且限制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弱化了史学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20世纪“有我之境”方法论基于史学与自然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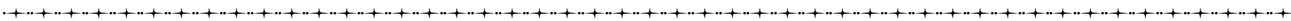
学的异质性 将史学研究的目光从认识本体转向了认识主体 ,强调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性 ,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扩大了史料范围和史学研究的范围 ,并将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 ,强化了史学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深化了对历史意义的理解 ,使得 20 世纪的史学研究方法多样 ,流派纷呈 ,成果丰硕。但是这种以体验论为其认识论根源的“有我之境”方法论 ,基于历史认识中始终存在主体因素介入的事实而否认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极端作法 ,使得历史成为浪漫主义的臆测和虚构 ,抹杀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甚至使得史学等同于艺术。

但是 ,在“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针锋相对的表面下 ,问题被深藏而不是被解决。“有我之境”方法论只是将对历史现象的研究转向为对历史认识的研究 ,只是将历史材料的函数转向为史学家思想的函数 ,实质上只是回避而不是解决以下问题 :历史的客观性是否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 主体性是否就等同于主观性 ? 应如何界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 又该如何对待历史认识的主观性 ?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能否具有兼容性 ? 现代科学中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已成为实在知识的对象 ,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均具有一种更为微妙的意义^[18]。在此背景下 ,重新思索上述问题将为 21 世纪重塑我国史学研究提供有利契机。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2.
[2] 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 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J].哲学译丛 ,1987

(4) 42-45.
[4] 德雷.历史哲学[M].王炜 ,尚建新 ,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5] 阿普尔比.历史的真相[M].刘北成 ,薛绚 ,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243.
[6] 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M].赵稀方 ,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57.
[7]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 ,张文杰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8]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付任敢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徐纪亮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0] CARR E H. What is history[M]. NewYork :Free Press ,1967 :22.
[11] 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2] 转引自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M].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111.
[13] 凯尔纳.语言与历史描写 :曲解故事[M].韩震 ,译.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14] 波普尔.客观知识[M].舒炜光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5] ANKERSMIT R F.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J]. History and Theory ,1989(28) :113.
[16]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 :下卷[M].罗达仁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927.
[17]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 ?[C]//汤因比 ,张文杰.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98.
[18] 伊·普里戈金 ,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 :人与自然的对话[M].曾庆宏 ,沈小峰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简讯 ·

河海大学力学教学基地团队获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称号

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 2008 年 1 月 3 日联合下发了《关于立项建设 2007 年国家级教学团队的通知》,确定全国高校的 100 个教学团队为 2007 年国家级教学团队 ,河海大学由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王惠民教授领衔的力学教学基地团队入选。

河海大学力学教学基地团队由涵盖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水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的 37 名教师组成。近年来他们同心协力 ,勇于开拓 ,努力探索适应 21 世纪工科人才培养的力学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创新教育规律 ,取得了丰硕成果 ,产生了国家精品课程 2 门 ,全国高校教学名师 2 名、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 1 名、河海大学优秀主讲教师 3 名 ,4 人获全国讲课竞赛一等奖、3 人获二等奖 ,3 人获江苏省讲课竞赛一等奖 ,基地建设经教育部验收结果为“优秀” ,团队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力学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评选国家级教学团队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两部要求有关高校做好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工作 ,为兄弟院校提供可借鉴的示范性经验。 (本刊编辑部供稿)